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作家身份认同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1949-1966)

◎ 戚学英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果
(项目批准号:11YJC751060)

本书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提供的出版基金全额资助

作家身份认同与 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 (1949—1966)

戚学英 著

2013 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家身份认同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1949—1966)/戚学英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8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书系)

ISBN 978-7-5622-6194-0

I. ①作… II. ①戚…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1949—1966

IV. ①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5929 号

作家身份认同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成(1949—1966)

作者:戚学英◎

责任校对:罗 艺

编辑室:学术出版中心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字数:258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版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定价:39.00 元

责任编辑:魏冬晴 冯会平

封面设计:新视点

电 话:027—67863220

邮编:430079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督印:章光琼

印张:15.25

印次: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导言	1
一、从“新的人民的文艺”到“社会主义文学”	1
二、个人、民族国家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5
三、个人、民族与阶级革命	14
四、阶级—民族国家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23
第一章 作家身份转型与当代文学话语机制的确立	31
第一节 作家身份转型与体制化	32
一、从“作家”到“文艺战士”	33
二、由个人写作到集体写作	38
第二节 作家身份转型与去西方化	43
一、“去西方化”与文学格局的变更	44
二、从“西化”知识分子到“乡土”作家	49
第三节 作家身份转型与当代文学话语机制的形成	54
一、阶级—民族国家话语的形成	55
二、非西方化思维结构与文化建制	58
三、“新的人民的文艺”与当代文学的现代性	63
第二章 作家身份认同与当代文学的阶级规训	71
第一节 个体与“人民”：以自由作家为中心	72
一、“思”与“信”的冲突	73
二、由“歧路”到“通途”	85
三、“应该怎样”与“自己想的”	92
第二节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以左翼作家为中心	97
一、“时间开始了”	97

二、“文化界领袖”与“难言的隐衷”	108
第三节 从革命到政治：以解放区作家为中心	113
一、“穿上共产主义者衣裳”的“莎菲女士”	114
二、“赵树理方向”与“中心作家”群	123
第三章 “新中国形象”与当代文学的身份构成	135
第一节 “本质真实”与历史主体询唤	137
一、新/旧现实主义之争	138
二、“真实”之辨与阶级规训	142
三、“真实性”与被询唤的历史主体	150
第二节 “新中国形象”与阶级主体性建构	157
一、“本质真实”与“新中国形象”	158
二、阶级性还是人性	165
三、人性、人情的阶级化分置	173
第三节 历史主体重构与“他者”化书写	179
一、被延迟的命名式：知识分子	179
二、被压抑的“自我”与“沉重”的肉身	183
三、历史的“他者”：对“个人主义”的指认与批判	190
第四章 阶级—民族国家认同与当代文学的“正典化”	195
第一节 通向未来的现实与阶级对立式主题结构	196
一、“历史真实”与阶级化的主题结构	196
二、阶级化的主题结构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202
第二节 介于史诗与颂歌之间的叙事结构	209
一、阶级叙事与史诗性结构追求	210
二、介于史诗与颂歌之间	218
第三节 阶级性与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	222
一、民间传统文化的阶级性整合	222
二、传统审美结构的阶级改造	229
参考文献	237

导 言

本书通过考察 1949—1966 年期间作家的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学形态的变化,探析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1949—1966 年期间的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的人民的文学”到 1960 年代初宣布社会主义文学性质的确立,社会主义文学在这一过程中得以生成并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学形态。而 1960 年代出现的“当代文学”概念是附着于社会主义文学形态之上的,因此,这一过程也是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1990 年代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则是这一文学形态的延续、反拨以及转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态势。揭示当代文学的生成过程并解析其中的话语结构、文化资源,有助于进一步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态势。

一、从“新的人民的文艺”到“社会主义文学”

在 1960 年代初对“当代文学”的表述中,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是同义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代文学从“伟大的开端”到社会主义文学性质的确立,其间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到“新的人民的文艺”再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之下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文学”最后到“社会主义文学”的过程。这一过程便是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从生成走向定型的艰难而复杂的过程。如果抽去这个过程及其形态,那么当代文学就成了无本之木,失去了灵魂。

1949 年 7 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原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胜利会师。这次大会把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正式确定为新中国文艺工作的总方向。这次文代会通常被认为是“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然而,

无论从实际情况看,还是从文艺界的认识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都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学。

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宣告:“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①这里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似乎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文艺。1952年,周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国文学,就整个说来,还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文学,而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导之下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文学。”既是社会主义文学,又是民主主义文学,这种含混的表述说明此时的文学并不是单一性质的文学。这是因为,“中国要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的过程。虽然社会主义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并正在以可惊的速度发展着,但在广大范围内,中国目前仍可以说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家。在中国还有资产阶级存在,这种情况反映到文学上,就是文学中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对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影响的强烈斗争”^②。中国尚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尚未形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因而在文化上必然存在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称当时的中国文学为社会主义文学还为时过早。

1950年代中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巨大成功,文艺界领导人对文化性质的认识也随之发生改变。此后,“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学”的提法不断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出版物中。周扬在《在中国音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地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要创造这种文化,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不是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创造的,我们的子孙继承我们的事业继续创造,这种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比任何时期都高,内容高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文化工作的总任务,使国家有文化,不是普通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的文化。”^③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第69页。

②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86,187页。

③ 周扬:《在中国音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周扬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34页。

1959年，邵荃麟在《文学十年历程》一文中兴奋地宣布：“我国年轻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党和人民哺育之下迅速地成长和壮大起来了！”同时，他也指出，社会主义文学是在前一阶段即新民主主义文学中孕育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学在前一阶段的末期中已经孕育成熟了，当革命一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它就立刻以一种生气勃勃的姿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量”^①。在1960年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上，郭沫若、周扬分别以《为争取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更大跃进而奋斗》、《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为题作报告，进一步确认了当前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过，这只是就发展态势立论，并不表明他们把1956年以前的文学认定为社会主义文学。按邵荃麟的话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孕育期，而只有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的文学，才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文学。根据变化的形势，周扬对“为工农兵服务”这一文艺方向作了新的阐释：“为工农兵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千百万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党的总路线服务，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的明天服务。”^②陆定一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则规定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就是用文艺的武器，极大地提高全国人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提高全国人民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③。

由此可见，当代文学这一概念是由当时人们所认定的中国社会性质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仍然留有私有制，此时的文学就必然留有资本主义文化因素。只有彻底地摒弃了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的社会，才可能出现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文学。周扬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将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学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从根本性质上区别开来：“现在我们的文化有个根本的变化，所谓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点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一样。因为，我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文化的性质从新民主主义的

① 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艺报》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专号（一），1959年第18期。

②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7月22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60年13~14号。

③ 陆定一：《陆定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艺报》1960年13~14号。

变成社会主义的。”^①周扬所说的这个“根本的变化”意味着当代文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彻底的决裂。在社会主义文学中,工农兵成为唯一的服务对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被完全排除在当代文学结构之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随之遭到彻底的清算。邵荃麟在阐述陆定一代表党中央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学任务时说:“这些任务的基本精神,我以为就是兴无灭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反对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文学道路,就是为了使我们文学更好地为提高人民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肃清资产阶级政治影响、思想影响而奋斗。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文学的根本任务。”^②当代文学的基本任务被规定为兴无灭资,这为当代文学确立了最基本的内在架构。周扬对这一基本任务的阐释则更为具体,也更为坚定:“第一点,要直接触动资本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文化,因为社会主义文化要和资本主义文化对立。”不仅如此,周扬还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以强化当代文学的阶级对抗结构,“它为什么叫社会主义呢,就是因为它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反资产阶级、反资本主义的。不反资本主义就不叫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不从这个根本去了解,那么谈遗产、谈什么外国文化都会讲不清楚”^③。

在1960年代前后对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反复论证中,当代文学作为“历史”被写进教科书进入大学课堂。当代文学被正式纳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当代文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非一开始就是确定不移的,从“新的人民的文艺”到“新民主主义文学”,再到“社会主义文学”,这一描述过程体现了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拒斥但又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复杂情形,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当代文学”这一指称被不断纯洁化、正典化的事实。那么,当代文学是如何从由多种文化因素构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图景,演化为一体化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呢?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叙述模式、审美旨

① 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意见》,《周扬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22页。

② 邵荃麟:《在战斗中继续跃进——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文艺报》1960年13~14号。

③ 周扬:《关于当前文艺工作中一些问题的意见》,《周扬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22~323页。

趣、艺术构成等方面有着哪些显著的变化呢？这些变化到底蕴含着怎样的历史动因、历史联系呢？当代文学究竟有着怎样的生成资源以及构成因素呢？

也许，我们还得从作家身份入手，由人及文，揭示当代文学的生成。

所谓身份认同，简单来说，就是个体与社会或某个阶级的关系确认，是个人遵守某种文化编码程序，逐步确定自己在社会秩序中的个体角色的过程。社会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的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同时，这一文化主体也会通过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自身的身份认同。伴随着这一身份认同的是个体自我心理和身体的体验。由于个体所处的社会情境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个体的身份认同也处于持久变动的过程之中。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维结构的转变，进入新中国的作家面临着新的身份转型：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转变，由身份不一的“作家个体”、“自由知识分子”向高度体制化、组织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无产阶级文艺干部”转变，由建构民族主体的启蒙者向接受工农兵教育的被改造者身份转变，由西化知识分子向“乡土作家”转变。简言之，即身份的阶级化、体制化和去西方化。进入新中国的作家身份是复杂多样的，而复杂多样的身份必然带来多样化的文学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规约，最终目的就是实现知识分子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以建设与资本主义相对抗并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社会主义文艺战线。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作家群体的身份认同过程，以及其中的矛盾、冲突直接影响着当代文学的生成与定型：它决定着当代文学如何从现代文学中脱胎而出，渐行渐远，最后形成与现代文学截然不同的文学景观。

二、个人、民族国家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

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是在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强势入侵之下进行的。自晚清始，面对外敌的入侵和中国积弱的社会现状，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成为中国社会精英所亟需面对、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的“现代性”之路从一开始便具有不可避免的特殊性：西方列强的入侵摧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大心理，摧毁了以“天朝”为中心的宇宙观、时间观，但同时也为中国输入了现代性意识。因此，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那场以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为宗旨的现代性变革必然是在中西对比框架下进

行的，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为参照系的。同时，这场现代性变革是在帝国列强入侵的条件下促成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实施霸权的产物，因此也天然地带有反抗帝国强权的性质。只有充分理解了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性产生的二重处境，才能理解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在个体与国家、个体与阶级、西化与非西方化之间复杂纠结的心境以及其中艰难的身份认同。

正如众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现代性并不是单一的概念，它蕴含着各种复杂的因素及不同的向度。李欧梵先生曾借用卡利内斯库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卡利内斯库将现代性总结为两个互为矛盾的方向，一种是启蒙主义经过工业革命后所造成的“布尔乔亚现代性”，它偏重科技的发展及对理性进步观念的继续乐观；而另一种则代表着对进步观念的反动，用以对抗前者的庸俗，在艺术上表现为现代主义，即一种审美现代性。李欧梵先生认为，“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是和西方启蒙思想的传统一脉相承的现代性，即“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它“经过五四改头换面之后（加上了人道主义、改良或革命思想和民族主义），变成了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①。这一现代性是建立在线性时间/历史观念上的。它打破了传统中国循环往复的时间观及治久必乱、乱久必治的历史观。因此，它一旦出现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历史观、进化的观念和进步的观念”^②。

在此无意辨析现代性这一本身即含混不清的概念，而是想借此进一步探究 20 世纪初国人所接受的是何种现代性，以及何种因缘使这一现代性得以为国人所接受。正如“现代性”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中即是一个已然分崩离析的概念一样，它在中国一开始便是一种由各种知识重新组合的话语权力实践。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是这一话语权力实践产生的场域。“五四”时期对启蒙现代性的接受正是基于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之上的。对积重难返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彻底失望和对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热望，使得中国社会精英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一现代历史观。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过清晰的描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

① 李欧梵：《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年，第 148~149 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4~5 页。

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①“五四”知识分子们将中/西置于直线前进的历史时间序列中进行比较，从而得出新/旧（老）、先进/落后的对立结构，并予以价值判断，“新”代表着先进，代表着正价值，而老（旧）代表着落后，代表着负价值。中国被赋予“旧”、“老”、“传统”的修辞而失去其合理性。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则被置于时间的前列，代表着“现代”性，代表着“新”，与中国构成新/老、现代/传统、先进/落后的价值落差。“五四”知识分子从“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中看到了沉痾已久的中国社会的希望以及前进的方向。于是，当直线前进的历史/时间观与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相结合时，对现代性的理解便理所当然地与个人主义、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仰捆绑在了一起，成为一种统治性的价值观和现代历史观。

“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以欧化为是”等口号便是对这一现代历史观的呼应，这些口号的背后，是对建构一个全新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激进的知识分子们将中/西文化置于现代的时间结构之上，从整体上进行比较，扬西抑中，赋予西方文明以普适性。他们或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现“真相”，以寻求向以西方社会为参照的现代民族国家行进的内在根据。我们且看胡适先生对东方（中国）与西方之间所作的比较：东方（中国）是“不能运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变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而西方社会则“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智慧来寻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灵，来改造物质的环境，来改革社会政治的制度，来谋求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这样比较的最后指向是国家的整顿和民族的复兴：“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我们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还占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

^①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第1358～1359页。

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① 在这样“百事不如人”的状况下，只能去学习、模仿先进的西方文化，“别求新声于异邦”^②。

“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摧毁性抨击，便是在这一现代历史观的观照下，对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历史诉求的回应：为旧的中国祛魅，同时询唤新的历史主体的出现。而这一想象中的历史主体又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中的“个体”为指向的。与中/西二元对立结构一样，“个体”与旧式家庭、传统社会形成对立结构。“个体”被赋予了与“新中国”、“现代”、“西方”同等的价值，是自我解放、自我建设，具有独立人格，拥有与社会对立冲突之勇气的个体，是为时代所询唤的新的历史主体，代表着历史的正面力量。旧式家庭、传统社会则与传统文化一起被视为反价值，构成摧折个体天性的非人道非理性的反动力量。鲁迅的“吃人”论及“救救孩子”的呼声即指向中华文明的历史纵深处，质疑中国传统社会制度、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为一直以来陷入循环怪圈的历史祛魅，同时站在与历史断然诀别的时间点上批判国民劣根性，召唤一个“现代人”的出现。

如果说鲁迅在其小说中所设置的叙事圈套有意无意地泄露了他本人对历史的悲观意识，那么“五四”时期对易卜生的推崇及中国式解读，则更生动地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个人主义的诉求。易卜生被认为“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③ 而为中国知识分子充分解读并冠以主义加以大力宣扬。“五四”思想革命领袖胡适便是众多不遗余力倡导易卜生主义者之一。胡适将易卜生主义归纳为“最健全的个人主义”哲学，认为这是目前中国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独立特行，敢说老实话，也向恶势力作战。”^④ 所谓的“最健全的个人主义”便是自我解放，从不健全的法律、宗教、道德中解放出来，“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而更重要的是完成新的自我建设，“把自己铸造成器，方才希望可以希望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5页。

②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68页。

③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0页。

④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1页。

有益于社会”，将自我建设成一个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的个体，“做一个‘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斯铎曼医生。斯铎曼医生为了说老实话，为了揭穿本地社会的黑幕，遂被全社会的人喊作‘国民公敌’。但他不肯避‘国民公敌’的恶名，他还要说老实话，他大胆的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胡适认为，“这也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真精神”^①。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斯铎曼成为将个人独立人格从传统社会的桎梏中自我解放出来，完成自我建设并与社会不良现象进行不懈斗争的代表。他们的形象已超出其本身所承载的意义。其意义不止于他们为中国输送了“我是我自己的”娜拉式“个体的觉醒”；也不止于他们被思想革命先锋们赋予的意识形态性：与束缚个人的已然腐朽的传统社会/文化决裂，将个体从旧中国的宗法制度及儒家文化中解放出来，变革社会，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更在于他们成为处于社会急剧变化之中迷茫无所从的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最亲近的文学形象，他们所体现出来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成为“五四”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对“国民公敌”、“最孤立的人”的认同，实际上也是胡适等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危机时的一种自觉的个体身份认同：以启蒙者的身份唤醒蒙昧的国人，并予其自由、平等的理性启蒙。这一身份认同因其强烈的使命感而带着几分“舍我其谁”式的悲壮意味在其中。

对“个人的自大”、“独异个人”的认同也同样是鲁迅先生本人及其笔下知识分子的显著特征。鲁迅先生以其特有的冷静与清醒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中国历史的“吃人”性质，提倡“立国必先立人”，呼唤“尊个性而张精神”的“个人”的出现：“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掇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② 鲁迅赞赏拜伦、雪莱、普希金、裴多菲等“摩罗诗人”，认为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③。他提倡“个人的自大”，认为中国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即在于没有“个人的自大”，只有“合群的爱国的自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1页。

②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③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01页。

大”。这种“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这些独异的个体或成为“国民之敌”，然而，“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①。我们更不难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独异个人”的谱系，尽管这一“独异个人”谱系无一不被打上绝望的烙印，但惟其绝望，更凸显其反抗绝望的“个人的自大”。

不管是胡适式乐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还是鲁迅笔下带有深重的悲剧意味的独异个体形象，都体现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近乎英雄主义式的自我认同：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斯铎曼等个人主义英雄，或像拜伦、裴多菲等为自由而战的诗人一样，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或不惜与家庭、社会决裂，或为之而献身。正如李欧梵先生所说的：“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只是打破旧习的一个支派。其本身并不是一个有体系的思想根基，甚亦不代表一个成熟、有系统的政治或哲学理论。因此，在评估其价值时，五四的个人主义或许应该被看作是当时知识分子肯定自我，并与传统社会束缚决绝的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就此观点而言，我们也许可以将五四时期归纳为一个史无前例的自我与社会，个人与整体的对立时期。”^②在“人的觉醒”这一启蒙思潮中，对自我的肯定，成为“五四”时期广大知识分子与传统社会文化决裂、解放自我的精神力量，由此衍生了个性解放、女性解放等时代主题。

然而，“五四”时期对“个人”的身份认同却又是与中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民族身份认同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对“健全的个人主义”、“全民公敌”、“独异个体”的认同是建立在知识分子们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之上的。在回应文化保守派的诟病时，胡适说：“我们的问题是救国，救这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里，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我们救国建国，正如大匠建屋，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③胡适对于个人主义的接受，也是建立在对西方文明世界的认同之上的，“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

① 鲁迅：《随感录》，《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7页。

②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55页。

③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5页。

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①。易卜生所推崇的凌驾于社会价值之上的独异个体，在“五四”时期被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现有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②在胡适看来，建设个人之人格与建设社会是一体的，无法分开的：“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力，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是如此，决不能造出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③“独异个体”终究只是“小我”，而最终意义则在于那个不朽的“大我”。个人之于社会独立却又紧紧关联在一起的思维方式在“五四”时期是占主流地位的。对个体的推崇，其最后落点仍在“邦”之兴与“国”之于天下。立国必先立人，“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④。而立人的最终目的在于立国，“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⑤。在个人与国家/社会这一组对立而紧密关联的范畴中，“个人”被突出，“人人都是一个无冠的帝王”^⑥。但同时，“个人”不是“独善的个体”，是不能自外于社会的个体。在胡适等“五四”知识分子这里，这一小我与其设想中的“大我”即新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是没有冲突的。因为按进步的历史观来看，新的民族国家与新的“自我”一样，代表

①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1页。

②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1~512页。

③ 胡适：《易卜生主义》，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88页。

④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⑤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⑥ 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68页。

着历史前进方向，是全新而进步的。

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一结合了现代历史观的“个人主义”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重组的重要进程。“个人主义”实现了其在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中的话语权力实践，儒家话语权力结构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个人主义”成功地扮演了一个“解放者”的角色，毫无悬念地摧毁了传统家族伦理和道德礼教。而毁灭家族制度，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正如周策纵所指出的，旧伦理的解体或许多多少少把个人从家庭与宗族的纽带中分离了出来，但同时也为国家、党派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对个人的控制清扫了道路^①。更重要的是，“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主流话语实践参与着新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李大钊在1916年发表于《晨钟》的《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中曾指出，只有那些敢于以新思想向传统挑战，敢于高扬自我的权利并致力于唤醒自我意识的思想者，才能承担创造新文化的任务。新的“个体”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所询唤的历史主体。这一历史主体是胡适们再三强调的拥有自我解放、自我建设的能力，哪怕成为“国民公敌”也要坚持真理、勇于批判的“个体”。“五四”时期个人身份被浓墨重彩地推出，是为了将个体从传统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截然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个人身份一开始便与民族身份纠合在一起。因为有着这一历史宏大意愿的支持，个体“自我”被赋予改造社会、创造历史的力量，即墨子刻（Thomas Metzger）所说的“一个富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及英雄气概的自我”。知识分子力求向世界充分展现这一“自我”，并力求通过其作品生产、复制这一充满着意识形态意味的“自我”。因此，可以说“个人主义”的话语实践形成了“五四”时期广大知识分子的价值信仰和运思方式，并延展为文学艺术领域内新的范式，即个性解放与国民性批判两大文本类型。这两类文本范式把文学创作推向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前沿。前者以个人主义精神烛照中国传统伦理，或指证中国伦理道德的“非人”性，或追求以自由平等为主旨的“人的觉醒”，倡导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后者则以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精神等启蒙理性为指向，指证国人在长期的文化浸染中所形成的奴性、嗜血性，批判中国国民的劣根

^① 转引自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28页。